

# 传教士与地方经济

——仲均安在山东活动述论（1876~1905）

王 森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仲均安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放弃经商之后来华传教。在中国的近30年里，他一方面宣扬教义，一方面从事世俗活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教民贫穷的状况，仲均安尝试从经济上帮助教徒。他费尽心思进行棉纺织业、改良农业等试验，不过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传教士发展地方经济的意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下很难实现。

**关键词：**传教士；仲均安；山东；地方经济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10)02-0057-05

自1807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之后，欧美基督新教各教派纷纷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向中国人宣扬基督教教义，以达到使“中华归主”的目的。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要落后。面对此种情形，许多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还致力于一些世俗活动，如：组织创办近代教育、医疗和出版事业等。

在见识了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后，有些传教士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尝试建立近代工业，用西方的发展经验来改变中国贫穷的面貌。目前学界对教会教育、医疗和出版事业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而在传教士发展工商业、参与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论述还不多见，因而有学者呼吁重视传教士和中国近代经济活动关系问题研究。<sup>[1]</sup> 本文以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仲均安(Alfred George Jones)为中心，考察其在山东传教的30年里为发展地方经济所做的尝试，以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经济活动有所探讨。

## 一、英国浸礼会和仲均安

近代以来，基督教会遍及山东各地，前后共有40多个新教差会在山东传教，其中英国浸礼会是新教在山东的三大差会之一。<sup>[2]</sup> 英国浸礼会属于新教的浸礼宗，创建于1792年，成立之后向世界上多个大洲派出宣教团。英国浸礼会在1840年曾派传教士到宁波传教，不过这些传教士没有多长时间就离开中国了。<sup>[3]</sup>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和其他教会一样，英国浸礼会也在这时重新进入中国。1861年5月1日，曾服务于中华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霍尔牧师(Charles James Hall)携夫人抵达芝罘(今烟台)，开始了浸礼会在山东地区的传教活动。<sup>[4]</sup> 此后不断有传教士被派来，教会也专注在烟台一带传教，不过效果并不明显。1875年，先后来华的8名传教士只剩下了李提摩太一人(Timothy Richard)。由于传教活动倍感艰难，他称英国浸礼会是一个“不幸的差会”，

收稿日期：2009-12-15

作者简介：王森(1984-)，男，江苏泗阳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7级硕士研究生。

发出了“这个备受苦难折磨的教会什么时候能看到美好的明天？”的近乎绝望的疑问。<sup>[5]</sup>李提摩太在这一年放弃了烟台地区的教务，将浸礼会的发展中心转移到山东内陆地区的青州府（今潍坊一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仲均安受浸礼会派遣来到中国。

仲均安 1846 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威克斯福德郡 (Wrexford) 新罗斯 (New Ross)，其先祖系 17 世纪从威尔士迁居此地。<sup>[6]</sup> 他由英国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抚养成人，长大之后经商，是当地一名成功的商人。由于受到海外传教运动影响，他决定去国外传教。在圣公会的神学院学习以后，他申请加入浸礼会成为一名自费传教士 (self-supporting missionary)。1876 年，他把生意委托给代理人后前往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意，而是通过信件委托代理人打理。从事商业活动的经验对他以后的社会经济活动有着重要影响。

1876 年 11 月，仲均安抵达烟台，开始了在中国的 30 年传教生涯。他先是和李提摩太一起负责浸礼会在青州的教务，后来李提摩太因“丁戊奇荒”的赈灾需要而前往山西，于是他一个人担起了浸礼会在山东的传教责任。<sup>[7]</sup> 此后他一直在青州传教，为教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直到 1879 年浸礼会才陆续派来传教士，他也因此和李提摩太一起被尊为“浸礼会中国差会的共同创始人”<sup>[8]</sup>。此后仲均安在青州和邹平传教，期间曾数次返回英国。作为浸礼会的老资格传教士，他为教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885 年，仲均安、怀恩光 (J. S. Whitewright) 和卜道成 (J. P. Bruce) 在青州建立一所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院。这所名为“葛罗培真书院” (the Gotch-Robinson Training College) 的神学院培养了很多中国牧师，后来成为著名的齐鲁大学一部分。<sup>[9]</sup><sup>[10]</sup> 他为神学院付出了很多心血，还撰写教科书和神学著作。1900 年 5 月他在中华基督教教会会上，当选为理事会委员。

仲均安也为山东新教各教派所敬重。义和团运动之后，山东各差会有意加强各教派间的合作。仲均安极力推动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合作，共同建设在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神学院和济南的医学院，这三所学校后来合并成为齐鲁大学。<sup>[9]</sup><sup>[10]</sup> 此后他专心撰写神学著作。1905 年夏，仲

均安去泰山避暑，所住的寺庙因为暴雨倒塌，他不幸遇难。

## 二、发展经济：帮助贫苦的教民

1888 年，济南府的邹平发生饥荒，浸礼会派人前往这里赈灾，同时开辟新的教区。仲均安于第二年来到这里，这是浸礼会在山东继青州之后的第二个教区。仲均安在这里一边赈灾，一边传教布道。而当地的极度贫穷则让他在福音事业之外，看到了世俗的现实。

### (一) 贫窶的山东

近代山东水旱灾害不断、人多地少，加之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仲均安在山东传教多年，对这里的民风民情了解颇深，更对山东极度贫穷的状况有着深切的体会。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从事过经济活动的商人，对于山东贫穷根源及解决之道，他有着自己的见解。1893 年 11 月 11~15 日，山东新教各差会在青州府召开了山东第一次新教联合大会。仲均安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从宗教和经济两方面开出了医治山东贫穷的药方。<sup>[10]</sup>

仲均安在《山东贫窶考》(《万国公报》，1895)一文中认为山东贫穷的根源是：(1) 今人确守古训，不念新学。人们只知墨守前人的陈典旧章，不知道世界变化的大势，更不懂新的科学技术。(2) 道心常受迷惑，不知启悟。人们不信仰基督教，心志不坚，常受迷惑。(3) 世人轻视德行，不能固守。这一点是说中国人不讲信用，商业贸易往往会受到影响，同时中国士大夫只会空谈、鄙视商业、骄傲无知，为社会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4) 衙署病民，不合规式。仲均安认为官府人员较多，而办事效率低下，多有贪赃枉法之事。同时中国法规不全，税则不一，影响商业。(5) 风俗习染，有碍富足。除了以上这几方面，他在英文本里还提到山东交通不便，各地度量衡不统一。

仲均安认为面对如此情景，以传布“上帝福音”为己任的传教士不应该仅仅传教布道，还要关注当地人们的生活。他认为贫穷会给人带来苦难，因而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罪过，而且贫困能够使人产生贪婪之心，让人犯罪，更重要的是贫穷会阻碍宗教的传播。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次基督新

教会议上，他却要谈论山东贫穷状况的原因。

那么如何改变山东贫穷的状况呢？仲均安认为向西方学习是最重要的，而且传教士可以从很多方面帮助中国人。首先传教士要继续布道，改变中国人的心灵。其次传教士要重视文字事工，多撰写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文章著作。这些文字不仅要让中国人阅读，还要寄回国内，唤起传教士所属国家人民对中国的关注，给予更多的帮助。最后传教士要重视世俗事业。他们可以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帮助中国人发展新型国内工业、培训中国工人、学习西方的技术、引进良种和改良土壤等。

## (二)工业实验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仲均安的传教思想接近于所谓的“社会福音派”，其强调传教士重视世俗事业与他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在英国是一位商人，来到中国后还通过信件维持着自己的生意。他于1881年返回英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处理生意上的事情。他具有商人对经济的敏锐观察力，因而对山东社会经济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当然传教士多来自于步入近代化的英美等国家，对于山东这样以农业为主的贫穷地区，很多人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就在1893年的山东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美国长老会的方伟廉(W. P. Chalfant)提交了一篇和仲均安题目相同的文章。仲均安身上所具有的商人实干精神使得他并不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上，还身体力行，用各种方法来帮助贫穷的教民。

1893年，就在仲均安呼吁传教士帮助中国学习西方科技、建立新型工业的同时，他在青州府开始了他自己称为“建立棉纺织工业的试验”<sup>[11]</sup>。经过在山东赈灾多年之后，他认识到单纯救济灾民只能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救难与生财交济”，“最便者又莫机器局也。苟能设立学堂招考生徒。以工代赈，庶几稍慰予心”。当时青州一带民间妇女多有手工纺纱纺线的习俗，但生产效率很低。他想到了把英国的纺织机器引进中国，用机器生产来代替手工操作。于是他在益都创建纺线局，自己出钱购买机器，聘请技术人员，招募教徒学习操作机器。他购买的机器分为两种，“一供工师人等常造各种机器之用，一为女工人等至要必需之器”。这个纺线局是面向浸礼会的教会社区，因

而所有工人都是教徒。尽管此时距离洋务运动开展已有数十年，但当时青州民风未开，人们对西方机器并不熟悉。在创建纺线局过程中，经历了重重困难“统计创成此事，如造作、调理、使用、试验均系生手，备极艰难”（《万国公报》，1898）。仲均安“率门下生徒，尽心力于纺线机器，经营四年，始得告成，试纺线自十二号至十六号，无不合用，门下生徒俱已纯熟”<sup>[12]</sup>。1897年，纺线局正式开始营业。

然而第二年，仲均安就在《万国公报》上打出了转让纺线局的“广告”。“兴工四年，仅可先开风气，且织布之新机，尚不免运以有待也……所成之工，聊堪试验机器，必得添足乃能诸事咸宜”。尽管他宣称“创此项工程作为表率，非为谋利计”，但很显然纺线局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达到“以工代赈”解决教徒生计的目的。他认为这项试验在技术上是十分成功的，但在商业上则是彻底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当地的商业条件并不成熟，而人们的素质也不符合这项工业的要求。有学者认为这个纺织工业之所以仅仅维持了4年，原因“可能是交通和其他经营条件使该项活动在当时无利可图，因此外国投资者不愿问津”<sup>[13]</sup>。我们还要看到仲均安的本意并非谋利，他建立棉纺织工业的意图是为了改善教民的生活，所以当时教民和教会对待这种机器工业的态度也颇为关键。仲均安在回顾纺线局整个创建发展过程中，已经指出工人并不完全适应机器生产。而据和他关系密切的库寿龄回忆，建立纺线局的所有资金全部由他一个人支付，浸礼会的其他传教士大都继续从事赈灾和传教活动，仲均安独自承受了试验失败的痛苦。<sup>[14]</sup>所以很可能教会并不支持他的工业试验。最终并没有人愿意接手纺线局，不得不以关门而告终。他购买的所有机器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一把火烧掉。

## (三)农业改良

这次失败给仲均安的打击很大，他在1898年山东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告诫所有的传教士：在目前的环境下，传教士希望借助经济活动来促进传教事业是不切实际的。不管传教士的愿望有多么美好，由于他的身份所限，工商业活动对他们来说始终有困难，毕竟他们不能完全按照商业原则来行事，尽管他们可能希望这么做。仲均安

的原意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来提醒传教士慎重行事,并非反对发展棉纺织工业,没想到《教务杂志》的编辑拿他和一位主张从食物、居所、服饰、医疗卫生等方面改善教徒生活的传教士布里斯托(William N Brewster)对比,认为两人的传教方法截然对立,值得深入探究。<sup>[15]</sup> 仲均安不得不写信给《教务杂志》的编辑,声明自己并不反对布里斯托关于传教的观点,更不是主张什么都不要做,只不过他认为目前的条件不够成熟,其他传教士应该另辟蹊径。<sup>[16]</sup> 事实上,他自己也尝试从别的方面来帮助教民改善经济状况。

早在1890年,仲均安就为治理当地一条频发水患的河道献计献策。同样他也关注着当地的农业。棉纺织业的发展需要棉花,就在创建青州纺线局的前后,仲均安就注意到青州当地棉花的品种不佳,质量较差产量偏低。因此他引进西方棉花品种试种,还编译总结了种棉方法,希望在当地推广种植。他从选种、治地、粪壅、作畦、布种、时令、选科、松土、打头、拾花、收成和换种等方面介绍了西方棉花的种植方法。他在1896年试种的结果是“在青州府试种洋种,桃大如鸡卵。每科结数十枚,亦有过百者”,比“西国寻常棉花,每科结百桃,多者百五十桃,亦有多至二百者”还有距离,但相较中国原有棉花收获已较为优。<sup>[17]</sup> 罗振玉在给该书写的后记中认为“中国土棉质粗而丝短,不如西棉之质软丝长,且收获亦不如西人之丰”,原因在于农人未能遵循中国传统农书的种植方法,而仲均安介绍的方法相对较为简单实用。不过他引进的棉花和植棉方法并未有很大影响,清末山东大规模引进推广的是美国棉花。

1898年,在反思青州纺线局失败教训的同时,仲均安从欧洲购买了西方蚕种试养。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在养蚕方面已经落后于西方,所以把西方的蚕种和养蚕方法介绍给贫穷的教民。1899年春,仲均安将蚕种分给12位蚕农试养。试验的结果非常成功,洋蚕所产的蚕丝不仅多于本地蚕,而且蚕丝成色非常好。仲均安自信地说:“毫无疑问这次的试验是成功的,尽管中国人在尝试和接受新事物上比较迟钝,但是我深信这些新蚕会慢慢流行起来的”<sup>[18]</sup>。为了推广新蚕,他写信给《教务杂志》,表示愿意无偿地把自己手中的蚕种分给其他地区的传教士,让他们

帮助宣传。不过此时他已经从青州避居青岛,因为义和团运动已经在山东地区勃然兴起了,这种动荡的局势已经不可能容许他再来从事推广改良蚕种的活动了。

### 三、结论

仲均安和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一样,他主要的任务是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当他深入中国社会生活,与中国人交往之后,他发现中国人在信仰之外还有物质方面的需要,有时甚至要超过对上帝的需要。因此他在山东赈济灾民、兴办教会学校,同时创办新型工业、改良农业,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介入了近代山东社会的变迁之中。虽然他的多次试验并没有达成预期目的,但亦在信仰之外给教徒带去了“福音”。

尽管传教士的职责是传布“上帝的福音”,然而进入中华帝国之后,很多人却纷纷投身世俗事业。这一方面是由于传教需要,另外一方面则是传教士和中国社会互动的结果。近代中国社会和欧美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人贫困的生活使得传教士在教徒的信仰之外,还要关注他们的世俗生活。传教士多来自己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有些人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经验帮助教徒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些早期社会改良活动多属个人自发行为,他们很少能得到教会支持,而且他们的尝试大多局限在基督教社区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之内,所以传教士发展地方经济的活动很难有太大作为。尽管如此,他们的这些努力和尝试还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

#### 参考文献:

- [1] 林立强.西方传教士与十九世纪的福州茶叶贸易[J].世界宗教研究,2005(4):84-94.
- [2] 刘天路.近代山东的新教差会[J].山东文献,1996,22(1):40-65.
- [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M].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9: 256.
- [4] HENRY RAYMOND WILLIAMSON. British Baptists in China 1845 ~ 1952 [M]. London: Carey Kingsgate Press,

- 1957: 22.
- [ 5 ] TIMOTHY RICHARD. Sketch of the English Baptist Mission[ J ]. The Chinese Recorder, 1877(8): 380 - 381.
- [ 6 ] N H CLIFF.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1859 ~ 1951, Ph.D.[ M ].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1994:109.
- [ 7 ] 李提摩太.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M ]. 李宪堂, 侯林莉,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105 - 106.
- [ 8 ] ERNEST WHITBY BURT.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Baptist Mission in Shantung, Shansi and Shensi, 1875 ~ 1925[ M ]. London: Carey Press, 1925: 20 - 21.
- [ 9 ] 郭查理. 齐鲁大学[ M ]. 陶飞亚, 鲁娜,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9.
- [ 10 ] A G JONES. The Poverty of Shantung—Its Cause and Treatment[ J ].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4(25): 181 - 220.
- [ 11 ] A G JONES. An Outline of the Aim and History of An Experiment Made in Shantung To Start a Cotton Industry—1893 ~ 1897[ J ].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9 (30): 228 - 231.
- [ 12 ] 庄维民. 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 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379.
- [ 13 ] 陶飞亚, 刘天路.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 M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245.
- [ 14 ] J S WHITEWRIGHT. In Memoriam Rev. A. G. Jones [ J ].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5(34): 449 - 453.
- [ 15 ] GEORGE FIELD FITCH . Editorial Comment[ J ].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9 (30) : 96 - 98.
- [ 16 ] A G JONES. Christ's Methods of Missionary Work [ J ]. The Chinese Recorder , 1899(30) : 248 - 249.
- [ 17 ] 仲均安. 山东试种洋棉简法[ J ]. 农学丛刊, 1897: 1 - 4.
- [ 18 ] A G JONES. A New Help for Our Christian Poor[ J ].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9(30): 415 - 417.

## The Missionary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 Brief Study of A. G. Jones' Activ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WANG Mia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lfred George Jones, a British missionary, gave up his business and came to China to evangelize. In his nearly thirty years in China, he not only evangelized, but also devoted himself to activities in society.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dition of poverty fundamentally, he tried to help missionaries in the respect of economy. He tried his best to carry out experiments in cotto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but didn't produce expected results. It proved that the purpose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to develop local economy could hardly come true in that time in China.

**Key words:** missionary; Alfred George Jones; Shandong; regional economy

责任编辑 范琳